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回顾与思考

邱均平 史尚元 王 琳

摘 要 信息资源管理是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变迁和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着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过程深深地嵌入到图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设、专业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与在我国的萌发(1970—1990年);②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先行探索(1990—2000年);③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管理的蓬勃发展(2000—2010年);④数智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2010—2022年),并对每一阶段的代表性理论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不同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并对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评价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标准是构建出专属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抽象规律,阐述了抽象规律应具备的特点,以期与信息资源管理未来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参考文献 53。

关键词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学 发展历史 基础理论 中国

分类号 G250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QIU Junping, SHI Shangyuan & WANG Lin

ABSTRAC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RM) is a produ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track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a research field to a discipline has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oretical stud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

This paper divides IRM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1) The ri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in China(1970–1990). In the first stage, the LIS community in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 research trend related to inform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and information view” created conditions for connecting LIS with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 Th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ese LIS community(1990–2000).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renam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qingbao”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1992 strongly supported LIS disciplinary and industrial

通信作者:王琳,Email:wanglinpk@163.com,ORCID:0000-0001-5937-8073(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ANG Lin,Email:wanglinpk@163.com,ORCID:0000-0001-5937-8073)

reform. The renaming of the department/college of LI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opened up a new situation for academic researc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restructure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led to the rise of a new paradigm of LIS. 3) The prosperi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2000 – 2010). In the third stag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was a hot topic at the forefront of academia. Scholar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ld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discipline and adapt to the talent need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Us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 an umbrella discipline conception to integrate various secondary disciplines is a feasible solution. 4)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data and intelligence age (2010–2022). In the fourth stage, tha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the goal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pparent. It constitutes the solid theore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LIS.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comparison of similar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the paradigm conflict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are hot issues.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build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to be solve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rimary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substantive progress on the foundation is to construct abstract law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laborat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bstract law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53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evelopment history. Fundamental theories. China.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据科学与智能科学的兴起,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也处在与其他新兴学科的激烈竞争之中。在数智时代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1],使该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学界与业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充分了解和梳理信息资源管理的缘起和发展脉络,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关键切入点。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着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过程深深地嵌入到图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设、专业

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之中,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演变历史进行阶段划分,分析每一阶段的代表性理论观点和思想,探讨其意义和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一个结构合理、内涵全面、多元开放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1]和未来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1 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与在我国的萌发(1970—1990年)

1979年美国学者Horton最早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对机构的信息内容及支持工具(信息设备、人员、资金、环境)的管

理^[2]。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信息资源管理发端于政府文书管理领域和企业信息管理领域的实践^[2,3],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成型。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两大领域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学术界的整合和升华,信息资源管理逐渐凝聚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明确了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目标和任务,开始成熟起来,并相继形成记录管理学派、信息系统学派和信息管理学派^[3]。除美国以外,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在信息资源管理各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学者有信息系统学派的 Beaumont 和 Sutherland,信息管理学派的 Martin 等。随着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社会的兴起和 ICT 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对信息资源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强,开展信息资源管理的社会、组织和技术保障条件更为完备,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得以快速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兴起引起了我国图书情报学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信息和信息资源等概念和术语已经在我国流行开来。当时虽然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尚未在我国出现,但与之相关研究的热度与日俱增,信息商品化、信息资源加工利用、信息市场、信息价格、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产业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和前沿研究领域。图书情报学界也主动加入这一信息浪潮中,面向信息的专业改革是1980年代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图书情报学界开展了情报与信息、图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探索,如情报概念对应于 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4],情报与新产业革命的关系是什么^[5],等等;就图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关系而言,出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属于信息科学的观点^[6,7];相邻学科档案学则出现了学科要转变到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上来的观点^[8]。这一时期“大情报观”的出现为情报与信息概念、图书情报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的对接创造了条件,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新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2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先行探索(1990—2000年)

1992年9月,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决定将“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尽管此举只是一个部委的行政命令,并未上升到中央文件或政策的高度,但却引发了图书情报学科和实践领域的大变革,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上我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脱胎于科技情报,科技情报事业是我国情报事业的主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80—90年代的科技情报学研究内容几乎等同于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因此“科技情报”的更名给整个图书情报学带来了巨大影响。

“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得到学界和业界积极响应,为学科改革增添了强大助力。信息资源管理恰好迎合了此阶段学科专业教育变革的需求,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图书情报院系改名的理想选择。院系名称由图书情报改为信息资源管理是我国图书情报学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学术研究、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打开了新的局面。1992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管理系,随即引发了全国高校图书情报院系改名的热潮。至2000年前后,国内图书情报院系基本都完成了类似的更名。与院系更名相匹配的是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信息类课程在各院系培养方案中大幅增加,普遍开设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特别是信息技术类、信息经济与市场类课程占比较高。

教育内容的实质性变化带来了学科专业的重组与调整。1997—1998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专业名称的出现成为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是信息资源管理对学科专业影响的延续。重组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带来了图书情报学学科范式的改革,学科的理论基础被管理学化和计算机化,Information Science 将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整合了进来^[9]。更广义的信息科学群(Information Sci-

ences)的研讨方兴未艾^[10]。信息管理则是信息科学群的应用性子学科群,包括信息传播学科、信息整序学科和信息服务学科,图书情报学属于后两类学科;学科群中各学科的共同点在于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信息的搜集、整序和传播活动),差异是学科的社会任务和研究视角不同^[11,12]。

1997年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思路,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旨在通过促进三个学科间的集成融合来产生新的学科内涵,放大学科能力^[13]。新兴的信息资源管理对三个学科的整合及一级学科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黏合剂作用。正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09—2012年)所述^[14],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建设“以探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规律为使命”,“初步完成了从重点对文献的管理到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构成了学科整体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座,这实际上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建立后就已蕴涵的发展目标,而后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更为清晰和完善。

“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不仅触发了图书情报学教育领域的大变革,也使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科学管理等研究课题激发起新的研究热潮^[15]。一方面,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系统全面地引入了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另一方面,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创新性理论,如三维结构理论(信息技术维、信息经济维和信息文化维)^[16,17],信息资源的元资源、本资源和表资源理论^[18]等。此外,对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关系问题探讨日趋深入,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实务要从文献信息管理向集成性的全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转轨,从图书情报学扩展为广义的信息资源管理是向高层次的跃升^[19,20]。关于信息资源

管理的学科地位问题,出现了一些前卫的观点,如应建立信息(资源)管理学一级学科^[21]。新学科建立的目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一是用信息资源管理来实现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的有机整合;二是秉承一级学科“大集成”的观念,更进一步地实现信息资源类学科(包括图书情报学类学科,非图书情报学类学科如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聚类,即文献信息管理类学科与现代信息管理类学科的二次集成。

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兴起,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热度持续增加,涌现出大量相关文献,数字图书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政策法规、信息市场、信息用户与服务等相关主题成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产生了很多标志性成果^[22-24]。至1990年代末,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开始进入高峰期,形成了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和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四大研究方向^[3]。总体上来看,中国图书情报学在1990年代引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无疑是成功的,学科建设有了质的提升,踏上了从文献管理范式向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的转型之路。十年间,在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的引导下重塑了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使图书情报学学科和事业跟上并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为进入新世纪后学科和教育的进一步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管理的蓬勃发展(2000—2010年)

自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引入我国的图书情报学以来,它就被看作是学科和专业教育发展的“新大陆”和“新市场”^[25]。以信息资源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学作为伞形学科概念来集成、聚合各二级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实现图书情报学科的一体化,成为了引领学科改革潮流的观点和主张。这将有助

于“图书情报学在未来演变成信息科学群中的带头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兴起促进了信息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大规模社会化应用,从而扩大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影响,为其与各种研究信息资源集成管理的新学科实现更高层次的整合创造了条件^[26]。

进入 21 世纪,网络信息基础环境日趋居于主导地位,“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也各自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如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 2000 年后进入了繁荣发展期^[27],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 2.0、数字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分类法、元数据、虚拟参考咨询等成为了学科专业教育中的亮点。情报学教育亦形成了以信息管理为主线的教学思路和培养方案^[28]。在此图书情报学教育振兴和创新的阶段,原有学科命名方案“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缺陷日益凸显,把机构“图书馆”和事物“情报”组合在一起不合逻辑,这种命名折中性很强,只能是暂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29];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已是数字化信息资源,均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组织、分析、检索与服务,具有无法割断的亲缘关系,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学科一体化势在必行^[30]。与原有学科名称相比,信息资源管理既可以揭示学科的本质特性,还能够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需求,培养出知识面宽广、能力结构合理的人才,因而成为了实施一体化后理想的学科名称。

2006 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当口,一些学者再度撰文发声,指出信息资源管理反映了“信息”引领图书情报学学科发展格局的现实,且具有极大的学科深度和广度,紧急呼吁应当将一级学科顺势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改名后,院系名称与学科名称一致,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院系所属的学科,对于专业教育和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十分有益^[31]。此外,还出现了理想化的命名建议,如以“知识组织与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29]。这在 20 多年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呈现出知识化、数智化的

今天,仍然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在实践方面,2000 年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为国家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国家信息化推进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批准设立国家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基地,其中北京、武汉、南京三个研究基地均依托信息管理学院,即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这些基地积极承担科研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和组织学术活动,为国家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提供战略咨询,为信息经济建设和信息社会发展提供智库服务,如北京基地的研究人员参与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制定工作。这些基地在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化高速发展时抢占先机,显著提升了图书情报学科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扩大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尚在形成的初期,为图书情报学成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主阵地做出了贡献。

4 数智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2010—2022 年)

在人类信息社会迈向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智技术开始深刻地改变信息基础环境和信息生态,使之发生重要的变迁与升级。图书情报学所依托的物质基础条件产生了根本变化,这必然带来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替和学科体系结构的重塑。在新一代数智环境下,图书情报学在院系建制、课程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力量等方面积极寻求新的突破,学科中的问题意识越来越聚焦到横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信息资源管理上来。以信息资源管理为目标导向的学科建设思路越来越清晰,信息资源管理作为图书情报学的学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日趋坚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立的内在理路已贯通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在初步解决了“变中求存”、进而探索如何“存中思变”的学科背景下^[32],图书情报学界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新学科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新的数智环境下,图书情报学非常需要一个更具融合性的新名称来统摄和集成日益泛化的研究内容,同时还必须体现学科的核心内容,字面上要更为简洁。在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中,学科名称修改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尽管是名称的微调,但“图书馆”改为“图书”,已经表明对机构与事物的属性进行了调整修改,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创造了条件。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个新名称,它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信息资源与信息资源管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学科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新名称将带来学科版图扩大、学科交叉增强和学科高峰增多的难得机遇^[33];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经对文献的管理、对信息的管理、对信息资源的管理,现已进入到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阶段,意指基于数据或信息资源来设计、优化和评价各种管理活动^[34],代表着管理学的最新理论形态,其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地位;③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学科知识体系综合集成的结果,形成了新“质”,可以放大学科基本能力^[13];④信息资源管理学是业已存在的学科概念名词^[35],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采用信息资源管理作为新学科名称,可直接借鉴信息资源管理学的现有内容和架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无须另起炉灶,能节约学术资源的投入,使图书情报学的学科转型更为顺畅。

在新的数智环境下,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两个相似概念的辨析与比较成为此阶段的热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信息管理是比信息资源管理更先进的学科概念,应优先选择信息管理作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标准术语。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选用它

会影响学科的发展。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将其界定为内容资源的管理,广义上将其界定为基于一种新的管理哲学和资源观的管理学科,图书情报学存在着从狭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的惯性,狭义的概念局限性很大,会使学科发展眼界变窄^[36];二是信息资源管理只是政府和企业管理变革以及信息化发展进程中阶段性的实践产物,其理论性不足,现阶段已演进至数智融合的信息管理,如果再用信息资源管理这一过去特定阶段的名称作为学科新名称,存在着时代和逻辑上的双重错位,是不合时宜的。

与信息资源管理相比,信息管理更能揭示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共同学科本质,更可彰显学科所包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统一性,并且它是经历了长时期实践检验的学术化、科学化命名,因此信息管理(学)是最合理、最准确和最理想的名称^[36,37]。广义的全方位信息管理是学科在新形势下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方向^[38]。实际上近二十年来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主体一直以信息管理为转型方向^[39]。信息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内容为“各类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规律、信息行为的活动规律以及信息管理系统运作规律”,理论体系分为信息本身的宏观管理、信息结构的微观管理、非信息机构(企业/公共)的中观管理三个层次^[40,41]。

在此阶段,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面临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学科中“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范式冲突,这在情报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情报观”的一些负面影响逐渐显露时,“情报概念对应 Intelligence、要恢复情报学和情报工作本来面目”的呼声日趋高涨,形成了“Intelligence”范式^[42]。支持“Intelligence”范式的学者认为,中国情报概念对应的英文是 Intelligence,而不是 Information(信息);中国情报学学科名称英文应为 Intelligence Studies,而不是 Information Science^[43]。他们不认同将中国情报学等同于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或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中的情报学部分,指出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培养出的人才“文不对题”,与国家情报人才培养目标相距甚远;针对“中国情报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情报”等学科泛化和情报缺失问题,提出应建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基本决策需求的中国情报学,包含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和国安情报学等分支学科^[42,44]。总体上看,这些学术观点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回应,部分内容也被合理地采纳和吸收进情报学的主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就提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守住“情报之魂”,构建基于新大情报观的军民融合的情报学,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引领式的情报人才,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目标^[45]。

5 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是摆在图书情报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涉及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多、学科间关系之复杂,是学科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图书情报学相比,具有范围更宽、研究主题更丰富、系统性更强和一体化等鲜明特点^[46]。在学科建设中既要坚守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基础理论,又要重视拓展和创新^[47],尤其是在学科体系框架整体性重构的过程中,避免出现堆积木或拼盘式的粗放式发展。新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不是图书情报学中以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局部延伸或单纯扩张,而是在更广义的信息资源和信息链视角下对原有整个框架体系的重新审视和再造重构^[48]。

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工作,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信息资源管理的元理论、哲学基础、基本原理以及理论流派、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等,

从科学学和知识社会学角度出发,阐明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底层逻辑和学术理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和意义,数智时代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信息资源管理的边界界定和融合发展,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术话语权与学术评价,数智环境下信息资源空间分布规律和动态变化规律,数智信息资源的组织、配置、检索和开发利用,新技术背景下信息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服务创新,信息资源管理相关学科平台和行业做大做强路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有组织科研与适合新时代需求的高质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将有力地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生态的良好发展。

能否构建出专属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抽象规律是评价该学科理论大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一般来说,这种抽象规律具有如下特征。

(1)能够继承传统图书情报学和档案学中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知识。当前,存在着“建立信息资源管理新理论体系就要割裂与传统学科关系”的不良倾向。在一些人看来,传统图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知识已经落后于时代,其关键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不够“时髦”,论及信息资源管理时唯恐避图书馆、档案馆不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学科的标准立异。这种倾向是错误的、短视的,会使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空心化”,不利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信息资源管理与传统学科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学和档案学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交叉汇聚而成的、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原理与核心知识是建设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必不可少

的构件。以信息组织为例,图书情报学、档案学中分类法与主题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并没有过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抽象规律,是本学科独特的标签和核心知识。核心知识是一个学科的立身之本,核心知识的多寡与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成熟度。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 Bulter 曾感言,图书馆学之所以学科地位不高,是因为缺少奥秘性知识。奥秘性知识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表征抽象规律的知识。数代图书情报学人一直在努力构建学科的核心知识,包括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要素说、莫尔斯定律、布—洛—齐三定律等规律,情报有序性原理、对数透视原理等原理,系统范式、认知范式、领域分析范式和人文范式等研究范式,DIKW 信息链、情报学基本方程式、信息栈等概念性理论。信息资源管理核心知识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归纳,以信息资源及其管理活动的内涵为导向、通过扬弃的方式将这些知识综合集成,纳入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知识集合中;另一方面,还需要以数智环境下信息哲学、信息生命周期、信息生态等理论为基础,依托技术、人文和经济三维结构,从元理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次提出新的信息资源管理核心知识,有效地揭示数据和信息资源的产生、转化、组织、交流、发现与服务等现象和管理活动规律。新形成的核心知识体系使信息资源管理拥有独特的学科身份,能够在“大科学”的时代背景下与相关学科展开良性的学术竞争与互动。

(3)既能解释传统学科对应行业的社会现象(如图书馆管理),又具有拓展性,能够阐明新兴学科及对应行业管理的内在机制。抽象规律的这一特征也是学科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体现。图书馆等传统信息资源管理行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从中总结出的抽象规律也较为成熟。数据策管、数据分析等新兴学

科对应的行业由于发展迅速,也产生了不少最佳实践,可以升华为抽象规律。新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所蕴含的抽象规律要兼顾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也就是说,不仅可以解释和指导传统或新兴行业,而且还能在传统和新兴行业相融合的环境下发挥理论作用,适用于虚实共生和万物互联的信息基础环境。抽象规律既可以阐明以虚运实的信息资源管理机制,让虚拟空间中的信息和数据有序地反哺实体物理空间,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又可以诠释由实入虚的信息资源管理路径,通过数字孪生等手段发挥数字信息资源的替代作用,来解决实体物理空间中的资源危机,以此来实现信息生态平衡,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4)能够凝结在学术观点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又相通的传统与新兴学术领域,具有统摄二级学科群的向心力。传统的图书情报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内涵充分展开的理论核心来凝聚各分支学科内容,因此一直存在着“学科的游离”和“游离的学科”的问题。信息基础环境的变迁加剧了原本就有的分支学科离心倾向,一些分支学科之间甚至无法开展正常的交流,反倒是与交叉学科的关系比与本学科的某些分支还要紧密。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科学、数据治理等新兴学术领域纷纷涌现。图书情报学虽然与这些学术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学科范围并不能涵盖它们,也无法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这些新兴领域或分支学科处于离散状态,不能整合进学科体系之中。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抽象规律、建立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信息资源管理的抽象规律能够在二级学科群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之趋于集聚而非游离。通过对抽象规律的研究,信息资源管理能够有一个围绕数据/信息资源命题的理论核心,各个二级学科均是基于这个理论核心扩展而产生的,传统和新兴分支学科领域之间的话语体系有了共通之处,可以相互交流并滋生出理论

创新土壤。

(5)抽象规律是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学理,能够为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不竭的动力,时代的变迁不会让这些学理轻易过时,也不会使之与人才需求脱节。信息科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fascinating field)^[49]。信息资源管理亦是如此。它的魅力何来?魅力应来自信息资源管理学理严谨的逻辑性和能不断地激发起探索兴趣的丰富内涵。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这些学理或基础理论是学科理论大厦的根基,由此衍生出的课程知识体系保障了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学理或基础理论比较匮乏,不足以支撑学科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而缺乏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学理作为基座,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自然难以有鲜明特色和不可替代性,致使学生满意度不高。十年前对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毕业生的职业问卷调查显示,毕业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过于简单,广而不专,缺乏专业壁垒,接近40%的毕业生认为专业课程不能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50]。近年来情况仍无多大改观。对相关本科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不满意专业课程内容,认为课程内容涵盖面狭窄,对就业竞争力和发展前景持消极态度^[51];另一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认可度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学生认为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专业感情不深^[52];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培养的调研数据分析则直接指出了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导致学科教育存在问题并有衰亡的风险^[53]。唯有通过学理和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对信息资源管理元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深刻解答,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才能“固本强基”,学科和专业教育方可在不断变化的数字智能技术环境中保持发展的活力,面对内外部的挑战始终有应对之道。

总之,在探索信息资源管理抽象规律过程中大力加强学理和基础理论研究,是建设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优化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知

识体系、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性举措。

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抽象规律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学术界从多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其中,重要着力点是要下大力气使本学科的学术氛围有根本性的转变。近年来,“跃进式”的学科发展不仅无助于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反而损害了学科的根基。学术界对此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须力戒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去除流于表面的、浮夸的、无长远价值的各种学科讨论与会议交流的生存土壤,不断增强学科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让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坐稳坐住冷板凳,构建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唯有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6 结论

信息资源管理是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变迁和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着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过程深深地嵌入图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设、专业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提出应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并对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评价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标准是构建出专属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抽象规律,对抽象规律需具备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以期与信息资源管理未来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

应当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信息资源管理对国家、组织和个体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和价值,富有很强的生命力,是新时代的“当采学科”,它的学科范围、研究范式、理论内容和应用领域会不断地发生新的变革。把握和引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继续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推向深入,建立结构合理、系统科学、成熟完善的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专 革的新使命与新任务。
业课程体系,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改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康中国战略下信息贫困群体的健康焦虑及疏导行动研究”(编号:21ATQ0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费成. 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1):4-8. (MA F C. Build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2023,13(1):4-8.)
- [2] 马费成,赖茂生. 信息资源管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MA F C, LAI M S.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6.)
- [3] 马费成,等. IRM-KM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MA F C, et al. Research on IRM-KM paradigm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evelopment[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8.)
- [4] 袁翰青. 漫谈科技情报工作[J]. 图书馆学通讯,1983(2):43-45,79. (YUAN H Q.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ork[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83(2):43-45,79.)
- [5] 严怡民. 试论情报与“新的产业革命”[J]. 图书情报知识,1984(1):14-19. (YAN Y M. On information and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1984(1):14-19.)
- [6] 曹聪孙. 图书馆学是信息科学[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5(3):43-45. (CAO C S. Library science belongs to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Work and Study,1985(3):43-45.)
- [7] 赖叔昌.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及其哲学辨析[J]. 情报学报,1987,6(2):86-90. (LAI S C.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c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differentiation[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1987,6(2):86-90.)
- [8] 徐定权. 我国档案管理已进入信息管理阶段——吴宝康教授谈档案、图书、情报信息一体化管理[J]. 上海档案,1987(3):5. (XU D Q. China's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professor WU Baokang on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archiv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J]. Shanghai Archives,1987(3):5.)
- [9] 李刚,孙建军. 从边缘到中心:信息管理研究的学科范型嬗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5):5-13. (LI G, SUN J J. From margin to center: on the change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s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ud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8(5):5-13.)
- [10] 吴慰慈. 社会信息化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新使命[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3(3):11-14. (WU W C. So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new mission of librarianship and intelligence education[J]. Library Work and Study,1993(3):11-14.)
- [11] 王万宗. 技术进步与信息管理学学科群的形成[J]. 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3):2-4. (WANG W Z.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es group[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1998(3):2-4.)
- [12] 王万宗. 论情报学与信息学的关系:从北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谈起[J]. 情报科学技术,1993(2):4-

7. (WANG W Z.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cs; starting from the renam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Peking University[J].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3(2):4-7.)
- [13] 赵国俊. 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J]. 情报资料工作, 2013(3):11-16. (ZHAO G J.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in China;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3(3):11-16.)
- [1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EB/OL]. [2022-09-01]. https://gs.sass.org.cn/_upload/article/files/bb/bf/9472a85948e280717d7c1d914864/47c61ac8-c9cc-448f-9fb0-71bb497f9a59.pdf. (The Sixth Discipline Evaluation Group of the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and basic requirements for doctor's and master's degrees;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EB/OL]. [2022-09-01]. https://gs.sass.org.cn/_upload/article/files/bb/bf/9472a85948e280717d7c1d914864/47c61ac8-c9cc-448f-9fb0-71bb497f9a59.pdf.)
- [15] 严怡民. 情报学理论研究[G]//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 情报学进展(第一卷: 1994—1995年度评论). 北京: 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社, 1995: 1-17. (YAN Y M.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intelligence[G]//CSD-STI.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volume 1: 1994-1995 annual review). Beijing: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1995: 1-17.)
- [16] 卢泰宏, 孟广均. 信息资源管理: 新的制高点[J].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92(3): 1-6. (LU T H, MENG G J.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new vantage point[J]. Foreig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1992(3): 1-6.)
- [17] 卢泰宏, 孟广均. 信息资源管理的演进[J].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92(3): 35-44. (LU T H, MENG G J.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J]. Foreig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1992(3): 35-44.)
- [18] 杨列勋, 马费成. 信息资源: 它的定义、内容、划分、特征及开发利用[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3(2): 1-3. (YANG L X, MA F C.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s definition, content,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1993(2): 1-3.)
- [19] 汤津红, 钟守真, 杨子竞. 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4(4): 25-27. (TANG J H, ZHONG S Z, YANG Z J.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librarianship intelligence education[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1994(4): 25-27.)
- [20] 卢泰宏. 国家信息政策[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3. (LU T H. 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y[M].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1993.)
- [21] 谢阳群. 21世纪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建设展望[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7, 20(6): 328-332. (XIE Y Q. Prospec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1997, 20(6): 328-332.)
- [22] 马费成. 信息经济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MA F C. Information economics[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3] 陈建龙. 信息市场经营与信息用户[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 (CHEN J L. Information market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users[M].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1994.)

- [24] 冷伏海. 市场信息资源与市场行为[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LENG F H. Marke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market behavior[M].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0.)
- [25] 赖茂生. 信息管理[G]//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情报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364-368. (LAI M S. Information management[G]//General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Third Edition).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third edition)·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21:364-368.)
- [26] 谢阳群. 信息资源管理[G]//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358-359. (XIE Y Q.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G]//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0:358-359.)
- [27] 肖东发,肖希明.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G/OL]//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 [2022-09-01].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70231&Type=bkzyb&SubID=47281>. (XIAO D F,XIAO X M.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G/OL]//General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Third Edition).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third edition & online edition). [2022-09-01].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70231&Type=bkzyb&SubID=47281>.)
- [28] 马费成,宋恩梅. 情报学发展史[G]//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95-196. (MA F C,SONG E M.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G]//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0:195-196.)
- [29] 孟广均. 重视发展二级学科 科学定名一级学科——再论本学科建设问题[J]. 图书情报工作,2000(12):7-10. (MENG G J.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level disciplines, and scientifically name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again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disciplin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0(12):7-10.)
- [30] 肖希明,司莉,吴丹,等. iSchools运动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变革[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XIAO X M,SI L,WU D,et al. The iSchools mov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and intelligence education[M].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7.)
- [31] 孟广均. 本学科的一级学科名称应顺势易名[J]. 图书馆论坛,2006(6):1-2,30. (MENG G J. The name of the LIS discipline be better changed into IRM[J]. Library Forum,2006(6):1-2,30.)
- [32] 叶继元. 变中求存,存中思变——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等关系再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6(2):29-34. (YE J Y. Striving for living in changing, thinking of changing in living—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brary science,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6(2):29-34.)
- [33] 李玉海. 抓住战略机遇 做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1):6-8. (LI Y H. Grasp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and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J]. Digital Library Forum,2022(11):6-8.)
- [34] 冯惠玲. 从文献管理到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创新之路[J]. 情报资

- 料工作,2013(3):6-10. (FENG H L. From document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based manage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3(3):6-10.)
- [35] 邱均平,沙勇忠. 信息资源管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QIU J P, SHA Y Z.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 [36] 赖茂生. 信息管理学科发展如何破解瓶颈悖论?[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9, 37(5):3-7. (LAI M S. How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aradox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37(5):3-7.)
- [37] 王知津,赖茂生,王延飞,等. 应对时代挑战,拓展发展空间: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情报学发展[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 45(3):1-5. (WANG Z J, LAI M S, WANG Y F, et al.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and expanding development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2, 45(3):1-5.)
- [38] 冯惠玲. 学科探路时代——从未知中探索未来[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0, 10(3):4-10. (FENG H L. A path-finding era of discipline: exploring the future from the unknow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0, 10(3):4-10.)
- [39] 初景利,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4):3-9. (CHU J L, HUANG S Q. From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som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level subjec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2, 66(14):3-9.)
- [40] 陶俊,王传清. 信息管理学科整合的变革路径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14):41-48. (TAO J, WANG C Q.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ve path arou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tegrat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4, 58(14):41-48.)
- [41] 钱明辉,徐志轩.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品牌化框架构建研究——纪念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创立100周年[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4):34-44. (QIAN M H, XU Z X. A study of branding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es management—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0, 64(14):34-44.)
- [42] 包昌火,刘彦君,张婧,等. 中国情报学论纲[J]. 情报杂志, 2018, 37(1):1-8. (BAO C H, LIU Y J, ZHANG J, et al. An outlin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8, 37(1):1-8.)
- [43] 包昌火,马德辉,李艳. Intelligence 视域下的中国情报学研究[J]. 情报杂志, 2015, 34(12):1-6, 47. (BAO C H, MA D H, LI Y. Research on Chinese intelligence studi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5, 34(12):1-6, 47.)
- [44] 包昌火,金学慧,张婧,等. 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情报杂志, 2018(10):1-11. (BAO C H, JIN X H, ZHANG J,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8(10):1-11.)
- [45]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 情报学报, 2018, 37(5):451-459. (SU X N. The rise of

-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8, 37(5): 451-459.)
- [46] 赖茂生. 学科转型,我们准备好了吗?[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1): 15-16. (LAI M S. Discipline transformation, are we ready?[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 2023, 44(1): 15-16.)
- [47] 马费成. 守正创新,继续推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1): 13-14. (MA F C.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 2023, 44(1): 13-14.)
- [48] 2022年度中国图情档案学界十大学术热点[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1): 5-12. (Top 10 academic hotspot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science academic circle in 2022[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 2023, 44(1): 5-12.)
- [49] HJØRLAND B. A fascinating field and a pragmatic enterprise;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 [C]// FRENANDER A, NILSSON S K. Libraries, black metal and corporate finance; current research in Nord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Swedish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orås; University of Borås, 2013: 37-45.
- [50] 吕斌, 李国秋. 组织情报学[M]. 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LV B, LI G Q.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cs [M].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 [51] 唐义, 应鸣蕾, 陈飞达. 按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培养本科生的需求现状——来自本科生的调查分析[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10): 78-84. (TANG Y, YING M L, CHEN F D. An analysi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emand for education under the first-ranking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J]. Library Tribune, 2018, 38(10): 78-84.)
- [52] 付立宏, 张锦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认可度调查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16(22): 36-42. (FU L H, ZHANG J P. A survey analysis on acceptability of the speciali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6(22): 36-42.)
- [53] 杨文霞, 吴海媛. 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0(19): 10-19. (YANG W X, WU H Y.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20(19): 10-19.)

邱均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院长, 资深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18。

史尚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王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18。

(收稿日期: 2023-05-20)